

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

——兼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商讨“炎帝故里”问题

彭志瑞

(炎陵县教育局,湖南 炎陵 412500)

[摘要] 湖南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和稻作农业的诞生地,也是炎帝族中心聚落的所在地,湖南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中华炎黄研究会认为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的说法缺乏关键证据支持,因而难以成立。

[关键词] 炎帝故里;湖南;拜火教;稻作农业;中心聚落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3-0099-08

Hunan Should Be the Real Birthplace of Yan Di Culture:

Discussing with the Chinese Yan Huang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on “the Hometown of Yan Di”

PENG Zhirui

(Education Bureau of Yanling County, Yanling Hunan 412500, China)

Abstract: Hunan is the birthplace of primitive fire worship and rice farming, and is also the site of the central settlement of the Yan Di tribe, so Hunan should be the birthplace of Yan Di culture. Chinese Yan Huang Research Association believes that Gaoping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is the hometown of Yan Di, which lacks the support of key evidence and is therefore difficult to establish.

Key words: Yan Di's hometown; Hunan; fire worship; rice farming; central settlement.

2016年1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山西高平神农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某大学历史学系一位副教授发言称炎帝渊源于山西的煤矿在地下着了火,由此认定“炎帝是山西人”^{[1]267}。当晚中国新闻网就以“中国炎帝研究学者发布新成果:炎帝就是山西人”为题作了报道。^{[1]328}随后,《中国文化报》、凤凰网、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媒体相继转载。原以为该学者观点作为一家之言,热闹一阵过后会归于平静,但不想其竟成了中华炎黄研究会的定论。当年4月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高平市编印的这次研讨会论文集以“炎帝故里 山西高平”为名正式出版,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中华炎黄研究会副会长王震中教授。

2017年11月2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文化交流研讨座谈会”在台湾新北召开,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希清教授在会上做了学术讲座。张教授说:“从考古发现、典籍记载、民间风俗等不同角度,印证了山西高平是神农炎帝故里,并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神农炎帝文化体系。”^[2]

既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认定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论证,因为“炎帝故里”之所在不但涉及炎帝文化研究的基础,更涉及

收稿日期:2017-12-12

作者简介:彭志瑞(1948-),男,湖南炎陵人,湖南省炎陵县教育局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化。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吗?

炎帝是个神话人物,又被奉为炎帝氏族的始祖,所谓“炎帝故里”,从个体生成的角度说,应当是拜火教的发源地;从集体生成的角度说,应当是农耕文明的诞生地;从氏族根基的角度说,应当是炎帝部落聚落中心的所在地。至于张教授说的“考古发现、典籍记载、民间风俗”只是某一事物存在的证据体系而不是它的发展体系,更不代表它的源头。

事实证明,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

一 湖湘大地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

(一)炎帝的本质是火神,神农氏也是“后人想像述称”

恩格斯指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这种神被假想为民族的祖先。”^[3]历史学家蒙文通认为:“五帝固神祇,三皇亦本神祇,初谓神,不谓人也。”^[4]¹⁶上古史专家徐旭生也认为“古人所称的帝就是现在人所称的神”^[5]¹⁹⁸。

关于炎帝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这部儒家经籍两处提到炎帝,均以炎帝为“火师”。《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6]¹⁵⁶⁷《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6]¹⁹⁰¹“火师”即是火神,是以火作标识的部落之宗神。

东汉班固编写的《白虎通》是当时上自天子、下迄儒生的学术共识,该书之《五行》言:“炎帝者,太阳也。”^[7]此“太阳”即是火之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专家何星亮也认为:“炎帝是古代的火神之一。”^[8]²⁸⁴

商周之际,由于大一统观念的影响,炎帝、黄帝等一些影响大的部落宗神上升为天帝。后来的人崇尚祖先崇拜,遂将炎帝人化,《国语》那段“少典生黄帝、炎帝”的故事便是炎帝人化的代表。

至于神农氏,也是战国时期由楚人许行抬出的一尊神。^[9]⁹国学大师钱穆指出:“中国古代史的传说……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包牺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像述称。”^[10]郭沫若也认为,所谓神农“实则指原始社会进程中的初级农业阶段”^[11]

炎帝身份的演变及其与神农氏的附会,拙文《上古炎帝起于南方考——对徐旭生将炎帝归于西北集团的质疑》^[12](以下简称《质疑》)中已有介

绍,恕不展开。

(二)最早的拜火教

何星亮指出:“火神形象是在火神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8]³⁶⁰火神观念的具体表达则是火崇拜。傅斯年认为:“古者中国南方有拜火教,诸部落奉此教者之宗神,以象物言之曰祝融(后称炎帝),以象功言之曰神农(农融古当为一词)。此一崇拜,其祠祀中心,原在江汉衡湘。”^[13]考古发现证实,拜火教发端于湖南。

1. 最早的太阳崇拜和凤凰崇拜。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洪江市高庙遗址出土距今7 000~7 500年的一些陶片,发现有“火”“☉”等符号,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高庙早期文化多次出现太阳崇拜图案,^[14]此前,甘肃大地湾的文字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可能有文字意义的符号”,高庙遗址颠覆了人们的认识。

这些最早的太阳符号表明,高庙的先民早已在7 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对太阳的崇拜。《周易集解纂疏》引东汉经学家荀爽语云:“离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15]日为火之精,对太阳的崇拜就是对火的崇拜。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文中说:“此所谓光融天下,已暗示其为南方拜火拜日之教。”^[16]¹²³说明南方的拜日教就是拜火教。何星亮也认为:“太阳崇拜与火崇拜是相互关联的。”^[8]³⁷¹

2004年3月25日,国内多家主要媒体转发了新华网长沙的一则消息:“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日前出土的一个白色陶罐上,戳印有我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距今已有7 400年的历史。这一发现为揭开凤凰‘诞生’之谜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实物资料,震惊了考古专家。”^[17]2006年2月16日《光明日报》又报道:“湖南省怀化市洪江高庙遗址被认为是迄今全国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祭祀文化遗址。”“在怀化高庙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大都绘着类似兽面、太阳和神鸟的结合体。”“有关专家表示:这些图案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凤凰’崇拜始于高庙文化。”^[18]

在古代,凤凰是火的象征。《鹖冠子·度万》:“凤凰者,鹖火之禽,阳之精也。”^[19]《初学记》引《演孔经》云:“凤,火精。”^[20]这些对先人文化的解读说明,凤凰崇拜也是火崇拜。既然凤凰崇拜始于高庙文化,高庙即是拜火教的发源地。

2. 最早的火焰崇拜和石头崇拜。据曹卫平介绍,在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距今6500年)的祭台上一共清理出49个祭坑。一是祭坑中有的积满草木灰,或一层黄土夹一层草木灰;二是坑内出土了较完整的陶器或可复原的陶器;三是坑底满铺红烧土或坑内积满红烧土块,或置放大块红烧土块;四是坑底置放大块砾石;五是坑底或台阶上置放大块兽骨。此外,在祭台附近共发现三处比较平整的红烧土堆积,有厚1厘米的草木灰覆盖,灰中有零星碎陶片,“不排除铺成后其上曾有燎祭一类的祭祀活动”^{[21]27}。

何星亮说过:“人们崇拜火,最初崇拜自然的火。在举行祭火仪式时,烧起一堆火,把火焰当作火神象征,人们向火焰叩头、跪拜,往火里撒酒、肉等祭品。”^{[8]380}据此可知,城头山祭坑内丰富的草木灰应是先民举行祭火仪式的遗存。祭坑内的陶器或大块兽骨,应是先民向火神呈献祭品的遗存。

祭坑内的砾石,可用何星亮的观点解释:“一些石块(如燧石)能摩擦起火,也是古人崇拜石的原因之一。”“原始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摩擦石块起火的真正原因,以为石块有某种神秘的属性,是有灵性的。因而感激它,崇拜它。”^{[8]348}砾石是可以生火的工具,将它们供在祭台上,也应是对火的祭拜。

至于祭坑内的红烧土,应是为了延长燃烧时间而分层铺在柴草上面的。

曹卫平指出:“较之我国新石器时代同期的其他文化遗址,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处于领先水平。”^{[21]26}

上述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的火崇拜遗存证明湖南是拜火教的发源地。炎帝既是拜火教的部落宗神,也必定出自湖南。

(三)古籍和民间传说的佐证

先秦典籍中不乏南方炎帝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晋人郭璞引《广异记》注云:“南方赤帝女学得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赤帝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曰帝女桑。”^{[22]170-171}《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郭璞注:“火神也”^{[22]206}

吕思勉指出:“炎帝者,祝融之异名。”^{[23]86}蒙文通认为“祝融亦为炎帝”^{[4]46},傅斯年也说祝融“后称炎帝”。三位大师的观点指向一处:“南方祝融”即是“南方炎帝”。

屈原《远游》进一步证实炎帝之神游息于湖南

九疑山:“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朱熹注:“南疑,九疑也。”^[24]

九疑山有“大”“小”之分。小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又名苍梧山,舜帝葬地。大九疑即九疑山区,《水经注》描述了其范围:“磐砦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25]任俊华认为:“所谓九疑山区实际是以南岭山脉为主体,东接罗霄山脉的广大地区。”^[26]

九疑山区具有十分集中而又年代久远的考古发现:广东韶关市马坝人遗址,距今12.95~13.5万年;湖南道县福岩洞遗址,距今8~12万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2万年;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距今7500~9000年;还有韶关市石峡文化遗址,等等。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了这一地区史前文化之丰厚。

丁山认为:“任何古代民族都有天神住居山巅的传说。”^[27]由于九疑山区是新石器文化策源地,又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因此以炎帝为宗神的先民自然奉九疑山群山之巅为炎帝神灵游息之所。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与舜帝浪漫凄美的故事相比,这一带关于炎帝的传说多是与消除饥饿有关,兹举三例:

1. 神农教耕于嘉禾。湘南学人王万澍编的《衡湘稽古》引《嘉禾县学记》云:“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28]7}

2. 赤制氏作耒耜于耒山。《衡湘稽古》载,炎帝设计田器,“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水经注》曰:‘县盖因水以制名。’然水乃因事,为作耒而得耒名矣”^{[28]9}。耒山,即今湖南桂东县与炎陵县交界的烟竹堡。因耒水得名的耒县即今之耒阳市,秦时置县。可见这一传说产生的时间不会晚于战国。

3. 赤粪氏作柘白于春溪。《衡湘稽古》载:“炎帝之臣赤粪氏作柘白于春陵……春溪之所由名也。《水经注》曰:‘春陵乡盖因春溪为名,汉长沙定王发以为春陵县。’”^{[28]9}春陵县故址在今宁远县柏家坪一带,秦时所置,其传说同样产生于秦以前。

湖南因炎帝传说而得三个古老县名,只有其为炎帝文化的藏精之所才有如此幸运。

关于炎帝在北方的资料,只有《国语》那段“炎帝以姜水成”的话,其源自《晋语四》内一个“重耳逆怀嬴”的故事。崔述评曰:“盖《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托于古之圣人。”^[29]拙文

《质疑》对此也有详细分析,恕不重复。

二 湖湘大地是稻作农业的诞生地

湖南因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其东是罗霄山脉,西是云贵高原,南是五岭山脉,北是滨湖平原,整个地势是一个三面环山、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盆地之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十分适宜动植物的繁衍生息。

第四冰期时代,南岭是中国大陆重要的潜在植物避难所,在冰期复暖的条件下,这些保存下来的物种又从避难所扩散,重新分布。^[30]在物种“重新分布”的过程中,湖南当是最先蒙惠的地区之一。考古成果证实,正是南岭之阴的这个马蹄形盆地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国稻作文明。

(一)道县玉蟾岩遗址:世界上迄今发现的第一粒人工栽培稻

据2005年3月2日《光明日报》载: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南岭北麓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出土了一粒被证明是1.2万年前的古栽培稻。袁家荣介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是研究农业起源重要的材料。”^[31]吴小红等多位国内外考古专家认为:“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可能是从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发展而来。”^[32]

专家的意见说明南岭的洞穴文明催生了湖南的稻作农业。

(二)澧县彭头山:中国稻作农业的诞生地

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陶片中夹有大量稻壳和稻谷。研究人员认为:“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稻作遗存的发现,它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稻作农业资料。”^[33]

农业考古专家卫斯指出:“是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人最早创造了中国的稻作文化。”^{[34]17}

张之恒认为:“距今8000多年澧水下游水稻的栽培已经越过了选育、驯化阶段,而进入到稻作农业的诞生阶段。”“长江流域属于稻作农业诞生阶段的新石器文化,只有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未发现这一阶段的稻作遗存。”^{[35]206-210}

与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对比的是北方粟作农业,张履鹏认为:粟的栽培最早是河南裴李岗和河北磁山两处遗址,距今分别为7500年和7300年。^[36]与彭头山相比,时间要晚1000多年。事实证明,中国的农耕文化诞生于湖南。

(三)稻作文化向中原的传播

稻作农业在湖南澧阳平原产生后,开始沿长江东扩西进,并且北上中原,在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形成大片稻作农业区域。其中北上中原又分东西两路。

卫斯描述了西路的“南阳通道”:^{[34]17}“溯汉水入陕南,入丹江口直至中原。”

李占扬描绘了东路的“江淮通道”:^{[37]151}“走长江中游地区进入黄淮河平原。”

李占扬还以十分确定的语气肯定了南方文明对中华文明作出的贡献:“使用细小石器的猎人们向北撤离以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文化到来之前,一直处在文化的真空,之间经历了大约2000年‘无人期’。”“史前学者习惯于将华南地区距今1.1~1.6万年的文化称为过渡期文化。1万年前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应来自洞穴中的过渡期文化。……洞穴新石器文化形成后快速发展并向北扩展,彭头山文化和贾湖文化均是发展并向北扩展的重要阶段或驿站……新石器文化向北发展中,找到了更适合自身发展的环境,使其得以迅猛发展,以至于这种进步文化继续向北拓展,到达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发达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并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夏、商、周崛起等积淀了重要的物质基础。”^{[37]151-152}

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记述了南方部落曾经的势力范围:“祝融诸族在虞、夏、商、周间的分布,实在洛邑迤东,河南北岸甚宽广之区域,东经许郑(河之南)卫(河之北)各地,逾曹滕诸境,直括淮水之北,鬼峰之阳,而抵琅琊东海。又有西北上的一支,在河东汾水区域。更有西南部的一堆,在今湖北境汉水中流。”^{[16]122}这个范围大致覆盖了黄河的中下游和长江中游。

如前所述,祝融即炎帝,傅氏所说“祝融诸族”就是炎帝氏族。由于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中原一带发现炎帝氏族的遗存并不意外。傅斯年指的“河东汾水区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这些地区的农耕遗存再丰富也只是“流”而不是“源”,是婴儿脱离母体后的成长壮大。

袁珂指出:“炎帝与神农……既经合而为一,他们的神话就相互渗透,不可分解了。”^[38]在中国文化上,炎帝神农氏作为首创农耕的符号已经固定。现代考古证明湖南才是农耕文明的诞生地,也是炎帝氏族的发祥地,这在学界众多学者的论著中得到

反复的强调。

三 湘东南:三苗族为中心聚落

(一)三苗族就是炎帝族

徐旭生认为:“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5]58}“三苗”犹“南蛮”,是得势后的北方部落对失势的南方部落的蔑称。以下资料证明,三苗部落就是炎帝部落。

其一,《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姜戎首领驹支回晋臣范宣子云:“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6]1053}说明姜戎氏是炎帝(四岳)之后。《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39]1731}则说明姜戎是三苗之后。《西羌传》虽作于南朝,但对于它的价值,顾颉刚作了特别肯定:“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书》的发现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用了。”^{[9]668}

两相对比,则三苗族即为炎帝族。

其二,东吴学者韦昭注《尚书·吕刑》:“三苗,炎帝之后。”^[40]

其三,吕思勉:“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23]89}

(二)三苗族的中心聚落在湘东南

1. 文献资料的记载。其一,《墨子》中的“炎人国”在湘中南。《墨子·节葬》:“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注:亲戚即父母)^{[41]101}原始社会中期,同一部落的先民形成了中心聚落,“炎人国”就是炎帝族的中心聚落。

有人据《鲁问》训“炎人国”为“啖人国”,谬矣。“炎人国”行的是二次葬,而《鲁问》记“啖人国”是另一回事:“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41]205}这个吃长子的部落叫“桥”,与炎人国是两回事。

我们还可将“炎人国”的位置定得更具体一些。张中一经过对出土文物和墓葬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楚人主要是沿江向东发展……楚人完全征服湖南境内的地方民族,其时代则到了战国中期偏晚了。”^[42]墨子是战国初期人,他所说炎人国不会在湘北,而在湘中南。

其二,《山海经》中的三苗国在“赤水”东南。《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22]193}据

顾颉刚介绍,苏雪林认为《山海经》中的赤水是一条类似于巴比伦神话中的河流。^{[9]650}它发于西北“昆仑之虚”,穷于南海“泛天之山”,^{[22]294,364}纵贯了大半个中国。仅以“赤水东”来定三苗国的位置当然困难。但《海内经》又说:“南方……有苗民。”郭璞注云:“三苗民也。”^{[22]455-456}至此可确定三苗国在赤水的东南方。

《山海经》的研究者认为:《山海经》本有《山海图》作依据,“经”是对“图”的诠释。原本《山海图》已佚,后人依据有关文字制作了不同版本的《山海图》。在所见到的各种《山海图》中,衡山赫然居于中央,而赤水从衡山西南经过。(见图1)这为《后汉书》所记的三苗国提供了更精确的定位。^[43]



图1 朝鲜《天下图》保存的“山海图”(局部)

其三,《后汉书》的三苗国“其国近南岳”。前引《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许嘉璐主编的译本作“羌姓国靠近南岳”^{[39]1731},此论有待商量,因为西羌与南岳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其距离也不能算近。“其国近南岳”的“国”应是三苗国。

其四,吴起说的“三苗之居”在衡山以南。《战国策》记有吴起对魏武侯的一段话:“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44]引文来自李维琦的标点本。之所以选择该本,是因为它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为依据,保留了原始面貌。

“三苗之居”的“居”是聚居之所,不同于三苗族活动的区域。这段话明白指出三苗族的中心聚落在湖南衡山以南。

吴起的话引起学界不少争议。有学者将衡山

训成南岳,然后又据《史记·汉武帝本纪》认为南岳即安徽霍山。不过,吴起只说衡山,未提南岳,所以霍山之说无来由。另有学者认为衡山是河南雒衡山,但是洞庭湖是搬不动的,所以也没有必要扯到河南去。

重要的是吴起后面还说了“恃此险也”,说明三苗之居是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如像上述所论,三苗国处于江汉至江淮间辽阔的地域,有何险可恃?

“楚之南”“赤水东”“南方有苗民”“其国近南岳”“衡山在其北”,这些信息排在一起,将三苗族的中心聚落锁定在湘东南。

2. 考古证据的支持。其一,茶陵县“属中国栽培水稻起源地范围”。在我国已出土的新石器遗址中,茶陵县独岭坳遗址有其特殊地位。首先是遗址附近有古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稻种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1994—1995年的野生稻调查中,发现茶陵县尧水乡保存一块覆盖面积达50多亩的普通野生稻。严文明认为:“它们理应是当地很早就生长的普通野生稻的孑遗。”^[45]其次是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栽培稻遗骸。张文绪等专家认为,独岭坳古稻“已经远离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人工种植的栽培水稻”^{[46]329}。独岭坳遗址距今已有6 800~6 500年,再上溯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相当长时间”是怎样一个时间概念呢?张文绪等充分肯定了茶陵先民的开创之功,认为茶陵“稻作农业自古以来十分发达,应属中国栽培水稻起源地范围”^{[46]329}。

其二,“茶安酃地区”的遗址群。在“其地近南岳”的各县中,以呈品字形交界的茶陵、炎陵(原名酃县,1994年改今名)、安仁三县(俗称“茶安酃地区”)遗址最为集中。(见图2)其中炎陵县在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以前属茶陵县。



图2 “茶安酃地区”示意图

茶陵县境内,除独岭坳遗址外,还有龙山文化遗址3处,^{[47]596}其中腰陂镇窑背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是彭头山已揭露面积的100倍,是城头山已揭露面积的4.4倍,其规模之大,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并不多见。

炎陵县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5处,其中樟树下遗址面积6 400平方米,文化堆积1.5米,^{[48]468}其规模和历史沉积在所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也不多见。

安仁县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49]其中何古山遗址距今5 000年左右,面积5 000平方米;细箫古遗址面积7 000平方米。二者都有相当规模。

在衡山东南方向,“其地近南岳”的还有耒阳市、衡南县和永兴县。耒阳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处,面积最大的是大市乡宜塘坳遗址,200平方米;^[50]衡南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为罗卜滩一处,未有详细说明。^[51]永兴县只在商周遗址中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遗物。^[52]上述三县市出土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没有年代说明,在数量和规模上也不能与“茶安酃地区”相比。

民间有“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的说法。湘东南由于降水和气候条件,常年处于“半干半湿”状态,土壤呈较强酸性。这一带地下文物保存条件远不能与我国西北环境相比。这些硕果仅存的遗址群,支持了三苗族也即炎帝族的聚落中心在湘东南的观点。

3. 湘东南成为炎帝族聚落中心的成因分析。美国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奥斯朋1923年在北京讲演时说到:“我们发现原始人不是森林居住的人,因为在森林里得食容易,演化极慢,森林里长不出敏捷的民族来。”^[53]张之恒教授在分析玉蟾岩文化时也指出,由于南岭地区天然食物资源丰富,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加之石灰岩洞穴的居住环境难以形成稳定的聚落群,因此也难以形成“聚落农耕文化”^{[35]207}。

两位专家的论述说明,先民的生存压力是生成农耕文化的动力。

席道合对茶陵独岭坳陶器遗存进行分析后,认为其早期遗存“与岭南地区古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或影响”^[54]。这也印证了吴小红、李占扬等专家关于岭南文化向北发展的论述。

处于湘赣之交的罗霄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与南岭呈倒“丁”字型交汇。罗霄山脉由三段组成,自南至北依次为诸广山、万洋山和武功山。

诸广山、万洋山地形地貌与南岭山脉相似,山高林密,自然界提供的食物资源丰富,而且遍布可供居住的溶洞。先民们的迁徙一开始应该是沿着与其生存环境相似的诸广山向北,再到万洋山。

从现在的炎陵县地界北上到茶陵县,是一个转折性节点。

炎陵县深居万洋山腹地,境内石灰岩面积约为357平方公里,^{[48]50}来自南岭的客人们不但“得食容易”,而且不乏可供居住的石灰岩溶洞。茶陵境内则是另一番景象,其山地与丘陵基本对半开,而且石灰岩面积仅为72平方公里。^{[47]63}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到达茶陵地界后,先民们不得不告别大山,来到丘陵区谋生。

独岭坳出土的遗存证明了环境变化带来的生存压力。在第一期遗存中,野生植物类食品只有酸枣一种,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张文绪等对茶陵独岭坳水稻的分析说明,独岭坳人栽培水稻的时间远早于距今的6800年。从独岭坳遗址揭露的面积、猪、羊、牛等畜类动物遗存以及房屋、水沟、陶器和墓葬遗存来看,独岭坳已形成了稳定的农耕聚落群。

茶陵以北的攸县和醴陵市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55-56]“茶安酃”西北的衡东和衡山等县却有发现,这说明先民在“茶安酃地区”进入稳定的农业经济阶段后,再没有沿罗霄山北上,而是向湘江中下游发展。“茶安酃地区”的房屋、农田就成了他们的故园。

《炎帝故里 山西高平》一书中,将庄里村炎帝陵列为“文化遗存”的头牌,因此也成为了“炎帝故里”的关键证据。查证清顺治版和同治版两本《高平县志》可知,两个不同版本的《高平县志》都没有提到庄里村有炎帝陵,只言换马村有一炎帝陵,并且还认为“帝陵故在湖南酃县康乐乡,此盖其虚冢也”^[57]。来自高平的资料显示:庄里村炎帝陵是2013年5月在该村之五谷庙动工兴建的。一县之中竟有两座炎帝陵,这不能说是正常的情况;庄里村炎帝陵作为现代建筑更是证明不了什么问题。因此,中华炎黄研究会关于“山西高平是神农炎帝故里”的观点难以成立。

早在2010年,文化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在“关于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的通知”中就批评了“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等不良现象。在“炎帝故里究竟在哪里”这一

问题上,学界见仁见智,聚讼纷纷,也很正常。不过,笔者认为,每个专家学者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之前,必须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和考证,这样才能避免以讹传讹,误导社会大众。

参考文献:

- [1] 王震中. 炎帝故里 山西高平[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 [2] 申亚欣. 2017 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文化交流研讨座谈会举行[EB/OL]. [2017-11-1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103/c1001-29625585.html> 2017/11/03 10:18.
- [3]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7,104.
- [4] 蒙文通. 蒙文通文集:第5卷[M]. 成都:巴蜀书社,1999.
- [5]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6]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7] 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4:177.
- [8] 何星亮. 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 [9] 顾颉刚. 古史辨自序[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10]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9.
- [11] 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5.
- [12] 彭志瑞. 上古炎帝起于南方考:对徐旭生将炎帝归于西北集团的质疑[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0(5):169-171.
- [13]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2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570.
- [14] 古 夔. 黔阳高庙文化探秘[J]. 建筑与文化,2013(2):115.
- [15] 李道平. 周易集解纂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94:309.
- [16]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3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 [17] 明星. 我国发现最古老凤凰图案[EB/OL]. [2017-11-10]. http://image.so.com/i?src=360pic_strong&z=1&i=0&cmg=c9a4e2f1d91ea970726bb737f7723d40&q=%E6%98%8E%20%E6%98%9F.%E6%88%91%E5%9B%BD%E5%8F%91%E7%8E%B0%E6%9C%80%E5%8F%A4%E8%80%81%E5%87%A4%E5%87%B0%E5%9B%BE%E6%A1%88.
- [18] 龙 军. 高庙文化遗址考古研究有新进展[N]. 光明

- 日报,2006-02-16(02).
- [19] 黄怀信. 鹑冠子汇校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151.
- [20] 徐坚.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2:723.
- [21] 曹卫平. 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原始宗教初探[J]. 武陵学刊,2013(1).
- [22]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3] 吕思勉. 先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24] 朱熹. 楚辞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9.
- [25] 陈桥驿. 水经注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07:891.
- [26] 任俊华. 魁魄氏、大庭氏、连山氏[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4):89.
- [27] 丁山.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 北京:龙门联合书局,1961:418.
- [28] 王万澍. 衡湘稽古:第1卷[M]//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 四库全书. 两江总督采进本影印本.
- [29] 崔述. 崔东壁遗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35.
- [30] 陈冬梅. 中国大陆第四纪冰期潜在植物避难所研究进展[J]. 植物研究,2011,31(5):624-625.
- [31] 龙军. 玉蟾岩遗址发现1.2万年前古栽培稻[N]. 光明日报,2005-03-02(02)
- [32] 吴小红.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陶器及其地层堆积的碳十四年代研究[J]. 南方文物,2012(3):8.
- [33] 裴安平. 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1990(8):29.
- [34] 卫斯. 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的再探讨[J]. 中国农史, 1996(3).
- [35] 张之恒. 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J]. 农业考古, 1998(1).
- [36] 张履鹏. 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J]. 中国农业史, 1986(1):67.
- [37] 李占扬. 史前文化迁徙的环境思考[J]. 华夏考古, 2010(3).
- [38] 袁珂. 古神话选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6.
- [39] 许嘉璐. 二十国史全译·后汉书[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40]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38.
- [41] 孙波. 墨子注译[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42] 张中一. 论楚人入湘的年代[J]. 江汉考古,1984(4):89.
- [43] 佚名. 朝鲜《天下图》山海经[DB/OL]. [2018-01-12].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216/21/5477831_254452926.shtml.
- [44] 刘向. 战国策[M]. 李维琦,标点. 长沙:岳麓书社, 1988:205.
- [45] 严文明. 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J]. 农业考古, 1989(2):76.
- [46] 张文绪. 茶陵独岭坳遗址红烧土中稻谷印痕的研究[J]. 中国水稻科学,2001(4).
- [47] 茶陵县志编纂委员会. 茶陵县志[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 [48] 酃县志编纂委员会. 酃县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49] 安仁县志编纂委员会. 安仁县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66-567.
- [50] 耒阳市志编纂委员会. 耒阳市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44.
- [51] 衡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衡南县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69.
- [52] 永兴县志编纂委员会. 永兴县志[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599.
- [53]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2.
- [54] 席道合. 茶陵独岭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 湖南考古辑刊,1999(00):216-217.
- [55] 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攸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667.
- [56] 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 醴陵市志[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789.
- [57] 龙汝霖. 高平县志(同治六年):卷三《祠祀》[M]//山西府县志辑:36册.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3.

责任编辑:黄声波